

# 陌生人與我（們）何干？

## —Georg Simmel 陌生人概念的社會與文化分析

魏書娥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副教授

05-2721001-5522

[sewei@mail.nhu.edu.tw](mailto:sewei@mail.nhu.edu.tw)

### 摘要

這篇文章首先討論了「異鄉人」抑或「陌生人」的翻譯問題，基於名詞涵括的範圍以及時代經驗的考量，採用「陌生人」較能適切地同時容納「異鄉人」、社會適應的動態過程以及現代性的生活經驗。接著本文重回 Simmel 的「陌生人」文本，強調對照《貨幣哲學》和《社會學》裡兩篇文本，才能比較完整地整理出陌生人論題的論述脈絡與層次。最後，藉由 Dale McLemore(1970)的「陌生人社會學」批判，重新檢視「陌生人社會學」在參照 Simmel 的「陌生人」文本方面的缺失，批判其文本詮釋涉及面向與層次的限制，並且借助上述討論提供關心當前都市生活經驗與晚期現代社會制度特性的研究參考架構。

**關鍵詞：**陌生人、陌生關係、陌生性、陌生社會學

# 陌生人與我（們）何干？

## — Georg Simmel 陌生人概念的社會與文化分析

### 從翻譯出發

德文 *der Fremde* 與英文 *the stranger* 一詞，在中文環境裡有翻譯成「異鄉人」<sup>1</sup>，抑或翻譯成「陌生人」<sup>2</sup>。現有中文譯本共五篇，兩篇根據英文譯本翻譯，三篇根據德文直接譯成，其中兩篇譯文譯作「異鄉人」，三篇譯作「陌生人」<sup>3</sup>。順此類推，另外兩個相關的名詞德文 *die Fremdheit* 與英文 *strangeness*，也分別被譯作「異鄉性」和「陌生性」。這五篇譯文共囊括七位譯者，沒有一位提出選譯「異鄉人」抑或「陌生人」的說明，也沒有區分不同譯詞可能隱含的意義差距。看來中文譯者依其偏好翻譯，不曾重視兩詞交錯使用的結果，形成了兩詞混用的現象。但是，德文原文的意涵具有不同概念面向與層次，牽涉論述觀點的定位問題，也觸及論述觀點之間的關聯性質。

除了在英文譯本的用詞上因為大家都使用 *the stranger* 和 *strangeness*，沒有遭遇用詞差距的質疑之外，關於上述兩層思考，後續相關議題的學者們(包括中文抑或英文使用者)並未加以重視，多半順其研究目的取向直接運用 Simmel 著名的定義，也就是附論文本開宗明義就提出的定義加以分析與申論。不過，還是有使用英文寫作的學者很早就注意到，同是一個名詞 *the stranger*，其下仍隱含著值得重視的意義差距，而且這個差距跟社會學傳統內部不同研究研究旨趣的發展脈絡有關。

根據 McLemore(1970)的分析，Margaret Wood(1934)早在《陌生人：社會關係的研究》(*The stranger: a study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書中就清楚區分出

---

<sup>1</sup> 「異」字一詞有分開、不相同、其他的、奇特、怪異等義，相近的中文名詞「異人」，意指關係疏遠的人，出自詩經小雅頍弁：豈伊異人，兄弟匪也。《辭源》，頁 1147。

<sup>2</sup> 「陌」字一詞有田間小道、街道、錢一百文等義，相近的中文名詞「陌路」，意為田間道路，多與人連用，指乍見而素不相識者。《辭源》，頁 1778。

<sup>3</sup> 這三篇〈陌生人〉中文譯本當中，林榮遠的譯法略有不同，他在譯文的第一個譯註提及「陌生人」也可譯作「外來人」或是「外鄉人」，在他的譯本中三者視上下文脈絡而交錯運用，至於 *die Fremdheit* 一詞則都譯作「陌生」。「外來人」或是「外鄉人」比較貼近 Margaret Wood(1934) 強調的「新來者」，但是，林榮遠也沒有強調「陌生人」概念蘊涵的這個面向。

Simmel 的 the stranger 概念中既包含有「新來者」新來者(the newcomer)，也包含有「邊緣人」(the marginal man)的成分。然而，一直以來的學術研究的發展趨勢卻產生了重「邊緣人」成分輕「新來者」成分的現象，即使 Alfred Schuetz(1944)也曾經點出這樣的差距，但是他跟 Margaret Wood(1934)遭遇同樣命運，其貢獻往往被後續相關學者忽略，the stranger 概念或是直接回溯到 Simmel 的文本，或是迂迴芝加哥學派的論述取徑強調社會排除的問題，「邊緣人」似乎代表了所有 the stranger 概念的涵義，成為陌生人社會學的主流研究方向。

就「邊緣人」而言，強調的是隨外來者加入團體遭遇到的異文化衝突與團體成員對外來者界定團體地位的主觀感受，確實也符合 Simmel 文本的部分關懷，翻譯成「異鄉人」是適切的；就「新來者」而言，進入團體的最初階段是關鍵的，他對既有成員而言，確實是面目不清全然模糊的，這個過程沒有在 Simmel 文本裡被明確討論過，卻是 Margaret Wood(1934)最感興趣的範圍。因此，新來者若進入團體累積了失敗經驗，接下來才有機會成為邊緣人，否則他就會順利成為內團體成員了，而異鄉人也就不再被有意識地限定成「異鄉人」，當然順此理路，Wood 的關懷又某種程度偏離了 Simmel 文本，即使 Simmel 的潛在漫遊者隱含著不同社會條件與異文化的接觸起點，但是他顯然更關心接觸後相互磨合的經驗歷程，更重要的是此經驗歷程對社會秩序的衝擊性質該如何定位。據此，本文使用「陌生人」和「陌生性」一詞，希望能保留 Wood(1934)強調 the stranger 概念中蘊涵的社會磨合過程，同時這個過程也隱含有形成與化解衝突的動力條件。

除了研究觀點的定位之外，der Fremde 概念的時代適用性也是譯詞要思考的一個方向。Simmel 提出陌生人論題雖然具有反思資本主義經濟普遍原則的啟發性，但是其時代背景僅止於經濟全球化的起飛階段(Robertson, 1992；魏書娥，2001)，後續的全球化歷程在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面向都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轉變，關於這些 Simmel 沒有機會觀察的變化，並且對之提出相應的時代診斷，因而「陌生人」這個概念形式能夠承受多遠的歷史內容變動就是後繼學者們所要面對的挑戰。所幸根據 Simmel 的社會學觀點，相互作用原則(魏書娥，2002: 399-402)，其實對「陌生人」概念預留了回應歷史條件的開放空間。如今回頭對照起來，「陌生人」論題的研究成果儼然形成了一支整合許多相關概念的特殊社會學傳統(McLemore,1970)，例如，疏離(alienation)、都市街道上的閒逛者(flâneur)，整體而言呈現了多元豐富的「陌生人」社會類型。

此外，根據 Merz-Benz 和 Wagner(2002)的分析，從 Georg Simmel 在 *der Fremde* (the stranger)概念中關於因經濟功能與不同社會產生聯結的商人的文化經驗，經由芝加哥學派 Robert E. Park(1928)關注移民勞工的社會邊緣人經驗，Anderson(1923)關注到 the hobos 的文化共生經驗以及 Siu(1952)關注到客籍勞工的過客經驗(sojourner)等，以及隨經濟全球化而脫離地理限制的旅遊者、流浪者與閒逛者等現代朝聖者(Bauman, 1997)與世界主義者(Hannerz, 1990)等，可以歸納成移動能力與文化整合面向的特殊社會類型分析，就此而言，這些在 Simmel 立論之後隨經濟結構變動而直接衍生的異文化經驗，帶給支配文化人們的感受不是全然未曾遭逢的異文化對象，所以他們面對的陌生人不是新來者，也不是只與外來文化碰撞而已。因應社會變遷而產生的現代性制度機制，制度性信任(Giddens, 1990; 1991)，間接增加了完全不相識者在公共場所的偶然共存機會，人們互不相識，卻可能相互眼熟而似曾相識，例如逛街的消費者(Bauman, 1997; 2002)，或是同班電梯的搭乘者(Hirschauer, 2005)，在公車站固定出現的等車人，甚至人行道上擦身而去的過路人(Goffman, 1963)。就概念的適用範圍而言，「陌生人」不只是邊緣人，也是新來者；「陌生人」不只是第一次經濟全球化歷史階段(1870s-1920)的社會文化經驗，也是晚期現代社會典型的社會關係與文化現象。相對而言，「異鄉人」一詞較難以涵攝新來者的內容，以及生活在晚期現代社會的制度信任體制下的社會經驗。以下本文將先重返 Simmel〈陌生人〉的相關文本，再次詮釋「陌生人」的社會學意涵，再就「陌生人社會學」的發展脈絡，思考「陌生人」論題在晚期現代化階段的社會與文化意涵。

## Simmel 論陌生人、陌生關係與陌生性

Simmel 論「陌生人」也沿襲他的學術分析風格，同一個主題常在不同文章裡或簡略或縝密地論述。他最早在《貨幣哲學》(1900)一書第三章第一部分「貨幣因其純粹的手段性格作為不被包纏在其社會圈底人格範圍」最後六頁<sup>4</sup>論及「陌

---

<sup>4</sup> Simmel, G. *Philosophie des Geldes*. Leipzig 1900, S. 223-228, auch in GSG6,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89, S. 284-291, oder in *Drittes Kapitel: Das Geld in den Zweckreihen*(Auszug) in: Peter-Ulrich Merz-Benz & Gerhard Wagner(Hrsg.) *Der Fremd als sozialer Typus*. Konstanz 2002, S. 39-45.

生人」主題。再次出現「陌生人」討論，已是八年以後，在《社會學：社會化形式的思考》(1908)第九章「空間與社會的空間秩序」的第三篇附論<sup>5</sup>約七頁。這兩部分別超過七百頁和八百頁的鉅著，都有意識地呈現了陌生人的社會學意涵。前者的社會學分析由貨幣現象出發，延展到貨幣流動的社會脈絡；後者的社會學分析，更從不同層次直接切入空間所匯集各種社會距離整體。

### 《貨幣哲學》裡的「陌生人」

Simmel 在分析貨幣作為經濟交換的手段時，就已經覺察到貨幣不只是貨幣實體而已；貨幣還是實質的載體，承載著交易關係；貨幣也是抽象的載體，承載著社會關係。三者能匯聚於貨幣一身，皆源於貨幣特殊的手段性格。貨幣是有價物，而且是可以作為行動手段的有價物；貨幣的手段性格就是不具特色，就是無差異性，貨幣就只是貨幣，誰來使用，貨幣的手段性格都不會改變。雖然幣值本身是相對穩定的，但是貨幣的價值成立與否跟貨幣潛在指向的交換對象是否存在，以及藉由哪些轉折而聯結出來有關，也就是交易網絡的大小與性質。貨幣要花得出去才是錢，錢要轉經多手才會是人人追求的財富，貨幣的流向編織著經濟交易的網絡。《貨幣哲學》除了哲學思辯與經濟分析，也兼顧了社會學旨趣，Simmel 觀察到同一個經濟交易過程，換一個角度看也是社會交換的過程。《貨幣哲學》裡的「陌生人」聚焦於他在社會團體裡所佔的地位以及扮演的角色，並且藉由猶太人跟錢的關係清楚指陳陌生人的社會學意涵。

前書這六頁扣緊貨幣轉進為錢的歷史過程，分析陌生人的不同社會意涵，並運用貨幣與陌生人的歷史糾纏，闡述猶太民族與錢被畫上等號的歷史處境與發展。首先，在原始民族選用外地物質加工作為貨幣的時代，陌生人是那個揭示貨幣之為有價物，得以將潛藏的交換對象具體聯結出一定規模的交換團體的人，特別是那些在巴比倫神殿前朝女孩胸懷拋擲貨幣之人。在物物或是物人藉由貨幣間

---

<sup>5</sup> Simmel, G. Exkurs ueber den Fremden, in: *Soziologie: Untersuchungen ueber die Formen der Vergesellschaftung*. Berlin 1908, S. 509-512. auch in GSG11,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2, S. 764-771, oder in Peter-Ulrich Merz-Benz & Gerhard Wagner(Hrsg.) *Der Fremd als sozialer Typus*. Konstanz 2002, S. 47-53. 《社會學：社會形式的探究》(1908)第九章另外兩篇附論分別是討論「社會界線」和「感官社會學」。

接交換的經濟關係之後，貿易表現為純粹的貨幣交易登場，商人就是陌生人的代名詞了，商人生存的社會條件是成熟的社會分工帶來生產者之間，以及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不斷拓展的交換行動關係脈絡，商人執行的經濟功能是透過從商的行動力與人脈，將首尾不見的生產關係網絡勾聯起來，穿梭各地的商人因而在其落腳處要適度尋求紮根佈局的可能性。於是商人開始慢慢擺脫暫時現身的形象，轉而在有利可圖之地深耕卻不能駐足不前。至此，陌生人扮演的社會角色是揭示貨幣價值的人；陌生人是外來的人。猶太人在歐洲扮演商人則是歷史偶然。

Simmel 認為猶太人「專」任歐洲商人一職與其離散經驗(die Diaspora)有關。自巴比倫出走，只能流浪各地的猶太民族為求生存，不得不脫離駐地生產者的營生方式，轉而透過介入生產行動鏈當中擔任媒合各類交易的中間商，這種求生策略促使猶太人編織成特定的經濟團體，但這團體卻跟猶太人自己毫無血緣連帶，猶太人歸屬此經濟團體卻是血緣和宗教兩方面的陌生人，因為猶太人扮演的經濟中間人角色不只包括行使貿易自由權，還包括十四世紀歐洲基督徒被禁止的放貸行為。

陌生人與外地脫不了關係，陌生人是行使外來材質使其具有貨幣價值的人；陌生人是外來的商人。相對地，陌生人也可能是抽身在外，無涉經濟生產關係鏈的在地人。十六世紀的荷蘭城市 Antwerpen 是當時的歐洲貿易交易中心，當地匯聚了來自歐洲各地的生產者交易貨物，相對而言，當地出生的 Antwerpen 人卻扮演起生產者與零售商之間的批發商角色，以及開立銀行提供貿易資金，對於在當地安家落戶而共同生活的「異」國人群來說，Antwerpen 當地人只經由金融往來與其相連結，反而變成了陌生人。陌生人的社會定位跟他發揮的經濟功能性質有關，跟他的出生地不相干。陌生人跟社會團體之間的界線主要根據陌生人對此團體扮演的經濟功能來劃分，在《貨幣哲學》這六頁的討論裡，這項經濟功能是貨幣、是錢、是金融；此外，Simmel 觀察到這項經濟功能運作順利的關鍵在多數情況下與陌生人來自外地大有關係，外來者藉由流通的貨幣跟當地糾結血緣關係的生產脈絡結合成新的經濟團體，隨著流動的金融，跨越地理界線，介入原先經

濟自給自足的社會團體成爲其中一份子。錢的流動方向導引出外地人與在地人之間的界線，兩者並非不相干，外地人是舊團體的新成員，是新團體的一份子，與團體其他成員缺乏經濟連帶以外的社會關係，外地人終究要擔任社會關係的陌生人角色。爲此，猶太人是 Simmel 眼中最典型的代表，剝除猶太人經驗，我們可以較抽象地說，在《貨幣哲學》裡，Simmel 分析的陌生人是一種貨幣關係的社會形式，而且這種社會形式面對的是跨越地理界線的貨幣經濟脈絡，而當時的貨幣經濟脈絡是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至於《貨幣哲學》第三章最具社會學旨趣，有關工業資本主義的經濟行動鏈不斷延伸與複雜化發展的論題，他並未明確地就「空間」這層社會學意涵繼續討論。《貨幣哲學》裡的「陌生人」充滿了「外來者」對團體可能具有的社會衝擊，借用 Dale McLemore(1970)的分析可以說是「新來者」的團員身份。

### 《社會學》裡的「陌生人」

相對於《貨幣哲學》裡的討論，將「陌生人」放置在具體的經濟發展脈絡，指涉發揮特定經濟功能的社會角色，也就是一種具社會學旨趣的形勢(eine soziologische Konstellation)<sup>6</sup>；《社會學》裡的「陌生人」，開宗明義就從抽象的命題出發，Simmel 已經清楚地抽繹出「陌生人」的社會學形式(die soziologische Form des »Fremden«)，並且強調這種形式的關係動態(das Fremdsein)特徵並非片面決定的，而是特殊的相互作用形式(eine besondere Wechselwirkungsform)，其結果可以是正面的關係(eine gage positive Beziehung)，當這種關係以一種對立的性質促使團體成員意識到彼此共享著某種基礎時，陌生人就是一種社會類型(die Fremden eines bestimmten Typus)。「陌生人」是漫遊(das Wandern)和固定(die Fixiertheit)兩個對立面的統一。「陌生人」蘊含兩個面向，其一，說明的是空間的關係；另一，象徵著人的關係。首先，陌生人社會形式呈現的空間關係，是一種來、去行動之間既分離又糾葛的矛盾現象，因而 Simmel 提出了潛在漫遊者的比喻，「今天來

---

<sup>6</sup> Simmel 強調這種關係形勢從大團體和個體的關係面向切入，尤其強調對大團體而言的陌生個體與團體之間產生的對立關係。

了，明天還在的漫遊者」(der Wandernde, der heute kommt und morgen bleibt – sozusagen der potenzell Wandernde)。潛在漫遊者既然不是今天來明天就走，那麼漫遊者保留移動(die Beweglichkeit)潛能，將它與當地人之間原先保有的空間遠距轉化成暫時建立的空間近距，因為它會在當地人知覺範圍內的空間持續出現。

空間關係往往承載著人際關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潛在漫遊者也是潛在的固定者，今日駐足，前行不知何日，那麼留下意謂著，漫遊者會以特定的方式和停留之處的人群產生某種社會聯結，陌生人關係說明的是個體和大社會團體的特定社會關係。陌生人社會關係的基礎在於駐足者和當地人沒有固著於土地的血緣、鄰里或是財產牽連，它們之間不是涂爾幹指陳的機械連帶關係，也不是藤尼斯指出的共同體關係。但是，潛在的漫遊者因其發揮的特定社會功能成為社會團體的一份子，非血緣也非地緣的社會功能決定了人際之間的關係距離。空間關係標示出人際之間存在身體距離與心理距離的交錯(如表一)。完全不落入距離概念的，不會進入心理意識的範圍，因為無關遠近，是毫無關係者，也不會被意識到其存在與否；身體距離與心理距離成正比的，在社會關係的光譜上不是親密就是疏遠。在工資本主義的時代，關係親近而近在身旁者，是家人是友人，關係疏遠也遠在他方者，是內在敵人，是不識者，這兩種關係清楚，在社會團體裡的角色都毫無疑問；相對而言，身體距離與心理距離成反比的，在社會關係的光譜上或是頻繁密切或是冷漠疏離。在工資本主義的時代，關係密切卻遠在他方者，是無緣者，關係冷漠卻近在咫尺者，是 Simmel 特別分析的陌生人。無緣者本是社會團體的圈內人，角色定位不會混淆。陌生人卻是社會團體內的圈外人，不同於關係親近者的圈內人，也不同於關係疏遠者的圈外人，結合了心理遠距與身體近距的矛盾，直接衝擊到社會團體內部的圈內與圈外區分界限。心理距離上的圈外人，同時是身體距離上的圈內人，陌生人是社會團體的一份子，在團體內擔任圈外人和對立者身份。

陌生人作為一種工業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突出的社會類型，其所勾連的陌生關係(das Fremdsein)可以是全然正面的關係(eine ganz positive Beziehung)，是一種



特殊的社會關係形式。藉由特殊功能連帶的團體成員身份，陌生人跟其他成員之間建立起眾多隨個別主觀知覺改變的關係內容，陌生人以一視同仁的態度面對關係多樣性奠定了陌生關係的客觀性。保持客觀，並非毫無瓜葛不參與，而是無涉家族利益與派閥勢力地參與社會，在團體中發揮它不偏不倚的功能，受到肯定的陌生人為此可能成為團體裡接受傾訴或是告解的對象，因而獲知團體內部的各方秘密，甚至可能積極作為仲裁者。關於仲裁者，Simmel 在〈陌生人〉附論當中特別聯結到《社會學》第三章「宰制與臣服」脈絡，以義大利城邦外聘的法官為例，說明陌生人在社會團體內部可能具有的宰制地位，相較於《貨幣哲學》裡「陌生人」指涉的商人身份，仲裁者的客觀地位可說是充分運用外來要素的極致表現，外來者保證客觀的作為，客觀者迴旋在自由空間來調解各方利益與衝突。

陌生關係也可能是負面的社會關係，Simmel 著重的社會學分析在負面關係部份論述不多，僅以舉例方式點到為止。例如，前述仲裁者調解不力，反而會因其未曾選邊站，陌生人淪落為各方攻訐的眾矢之的。另外，陌生人就像窮人和內部的敵人等是社會團體內部蘊生的圈外人和對立者。雖然，Simmel 未曾在〈陌生人〉附論進一步說明原因，不過在《社會學》第七章「貧窮」討論的脈絡裡，他分析過對社會團體而言，窮人本非外來者，窮人是相對性的指稱，窮人是滿足社會倫理的必然產物。就社會功能的正負面向切入分析陌生關係，在 Simmel 的「陌生人」論述當中，明顯地偏重正面取向而忽略負面取向，但是這層負面取向卻在後續的芝加哥學派被充分演譯與運用，這當然跟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問題關懷(邊緣人)有密切關聯，也是後續「陌生人社會學」的發展重點。

再回到普遍層次的概念詮釋與分析，除了具體的陌生人(*der Fremde*)和陌生關係(*das Fremdsein*)之外，抽象層次的陌生性(*die Fremdheit*)是 Simmel 論「陌生人」的基礎原則，以他利用超過三頁的篇幅來討論，約佔〈陌生人〉附論總頁數一半來看，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呼應附論第一段的論述，Simmel 在這篇短文裡要強調的是，「陌生人」是兩個對立面的統一，從現象面而言，這兩個對立面是漫遊(*das Wandern*)和固定(*die Fixiertheit*)；從空間象徵而言，這兩個對立面是

遠距和近距，對立面的統一是在表面互斥的敘述下，尋求背後隱藏的共有性(die Gemeinsamkeit)，而此共有性是兩者之間不可再化約的公分母，也是許多表象差異的共同基礎，對各樣表象產生規範性的指標作用。另一方面，聯結到實際的社會脈絡，這些共有性常常指涉的是團體(die Gruppe)、類型(das Typus)和人性(die Menschheit)，落實在具體社會條件上，在工業資本主義的大環境裡不外是關乎國族的(national)、社會的(sozial)、職業上的(berufmaessig)或是普遍人性的(allgemein menschlich)等單元。因而，陌生性隨差異緊密結合社會脈絡，陌生性也隨此統一高掛社會人群頭頂，以規範、價值、制度、語言、知識體系等文化元素發揮影響，得以形成特殊關聯拉近普遍關聯的現象<sup>7</sup>。

相對於陌生性的正面功能，Simmel 也提出負面功能，來自普遍關聯激發特殊關聯的現象。例如，親密關係裡的忌妒。唯有負面情感忌妒才能探測浪漫愛的深度，情人之間經由忌妒肯定彼此擁抱的愛情關係，既是獨占的能夠限制第三者介入，又是唯一的保障可以維持愛侶相守。又如市民稅和猶太稅的關係。猶太稅相對於市民稅扮演著「他者」的角色，非我同類對照出我群最遠的共同界線，界線清楚了，團體成員的權利義務以及禍福與共的對象與歸屬才能具體落實。人性底層的幽闇或是他者的功能都在於伺機提醒團體存在的事實，而這事實正因為既存卻常被成員「身在此山中」視為不見。特殊關聯與普遍關聯之間的相依相伏構成 Simmel 時代特殊的社會與文化關係形式，蘊含著不可忽視的跨時代概念演譯空間，任由後繼研究者的研究旨趣與時代診斷捏塑成型。

總體而言，Simmel 論述的「陌生人」包涵陌生人、陌生關係到陌生性等抽象層次不一的概念，「陌生人」分析的切入觀點隨 Simmel 先後在《貨幣哲學》和《社會學》的關懷主軸差異，分別由經濟交易的社會形式以及空間關係的社會

---

<sup>7</sup> 關於陌生性這層抽象關係，Park & Burgess(1921)的英譯文本以及陸先恆、馬家輝(1993)合作的中譯文本都注意到了，Park 和 Burgess 特別在譯文中相關段落起頭標出重要的概念內涵，依次是移動(mobility)、客觀性(objectivity)、值得信任者(confidant)、自由(freedom from convention)和抽象關係(abstract relations)等五者；陸先恆和馬家輝則是在譯文前註明了相關討論未重視的抽象原則。另外，Bauman(1988)的討論則是以運用普遍原則與特殊原則之間的張力關係來建構他提出的都市陌生人(the strangers)。

意涵交織成豐富多變的研究領域，由於後繼學者不曾間斷的投入，整體累積的成果竟足以視為社會學研究的一門次領域，學者 Dale McLemore(1970)曾經直接聲稱為「陌生人社會學」(sociology of the stranger)的學術傳統。

## 「陌生人社會學」的批判與批判「陌生人社會學」

「陌生人社會學」的指稱其實並非 Dale McLemore 所創，他在〈Simmel「陌生人」：一個概念的批判〉文中清楚提到語出 Alex Inkeles (1964)。但是，這並不表示「陌生人」概念已經在 McLemore 之前就被相關議題研究者批判地運用，McLemore 發現許多研究者都是視為當然地引用在各自著作中，以致於「陌生人」概念豐富的層次以及運用的面向被局限在特定社會條件下，被誤解或是錯用。他為此重回〈陌生人〉<sup>8</sup>附論內文分析其社會學意涵，因而提出三項論題，它們分別是「源自 Simmel 的陌生人分析包括兩類研究傳統；關於『陌生人』、『邊緣人』和『新來者』的社會學分析已經相互混淆；這三者的混淆妨礙了『陌生人社會學』更多產的發展」(1970: 87)。

Dale McLemore 首先根據 Margaret Wood(1934)的觀點以及人類學研究成果，將 Simmel 的陌生人分析定位在環繞著陌生人抵達團體週遭的特殊環境、陌生人的個人屬性和陌生人性質，而且根據這層意涵推衍 Margaret Wood 已經藉由當時的社會發展開創了對「新來者」的社會學分析傳統，即使此後不乏學者引用，但是其推演的潛力遭受低估，往往引用者立刻又跳回 Simmel 的用詞，引以為其研究當中陌生人傳統的源頭，即使 Alfred Schuetz(1944)也曾經點出新來者和邊緣人的差距，卻也不例外地跟 Margaret Wood 的看法同遭忽略。然而 Simmel 的陌生人分析並不如 Margaret Wood(1934)的觀點那樣強調社會互動的源初階段，

---

<sup>8</sup> McLemore 並未對照德文原文《社會學》裡的「陌生人」附論，他參考了 Kurt H. Wolff(1950)翻譯的英文版〈陌生人〉附論，並且指出英文版第一個翻譯本其實是 Robert E. Park 和 Ernst W. Burgess (1921)的合作成果，而且兩個版本之間即使小有差異，也都被學界評為忠於原著，但是，相較而言後出版的 Wolff 版在當時學界較多人引用。另外，他當然也沒有對照《貨幣哲學》裡的「陌生人」篇幅。

Simmel 的陌生人分析焦點在互動後期的定局狀態，他重視的是陌生人身上背負的矛盾屬性，一種特殊的社會排斥形式。長久以來，研究者若只強調這個面向往往會中斷了陌生人的「新來者」內涵，而這層意涵就 McLemore 的觀點而言，可以是 Margaret Wood 和 Alfred Schuetz 為之補強的最大貢獻 (1970: 88-9)。

相對於「新來者」面向被低估，芝加哥學派學者 Robert E. Park (1928) 啟動的「邊緣人」取向從來就是詮釋 Simmel 陌生人概念的主流。這種研究議題的主流地位之所以確立跟研究觀點的擷取密切相關，也跟參照文本的認定脫不了干係。長久以來，《貨幣哲學》裡的「陌生人」幾乎被後繼相關議題的研究者忽略，以 Dale McLemore (1970) 對 Simmel「陌生人」概念批判為分界，包括之前的 Robert E. Park (1928), Alfred Schuetz (1944, 1945), Paul C. P. Siu (1952) 等人，包括 Dale McLemore (1970) 在內的著作皆是如此。他們並未重視 Simmel 的「陌生人」論題來源跟十九世紀末的「新經濟」密切相關，在《貨幣哲學》裡的討論，是從使用貨幣的經濟行動鏈不斷延伸帶來社會關係的複雜化角度出發，凸顯社會學形式的新對象，並且單就歐洲文明發展史上確實出現過的證據，猶太族群的離散經驗，建立貨幣經濟脈絡下的陌生人論述，與《社會學》裡的「陌生人」論述相比，只呈現偏重歷史旨趣的關懷，但是貨幣關係背後透顯的社會互動、社會網絡到社會制度的層次區隔卻是比較清楚的，忽略了《貨幣哲學》裡的「陌生人」往往也容易忽略了資本主義文明運作邏輯的分析角度，以致於往往也單單從社會團體的界線出發，側重關懷社會團體的排斥問題。因而，累積成陌生人的「邊緣人」意涵，是順應陌生人「既是又是」的定義 (McLemore, 1970: 86)，直接對負面社會現象進行分析與描述。

或是 Dale McLemore 之後的 Erving Goffman (1963), Ulf Hannerz (1990), Zygmunt Bauman (1997), Antony Giddens (2000) 等人的討論皆是如此，也都沒有提及《貨幣哲學》裡的「陌生人」，有趣的是在他們的相關討論裡，雖然各有側重微觀社會學層次的社會互動，或是巨觀社會學層次的現代性制度，但又都殊途同歸地指出陌生人關係類型及其置身的制度環境是當前社會文化的表徵，它們是當

前人們共享的命運，陌生人隨處可見，陌生關係不盡然是病態關係，陌生性是晚期現代性的一部分。

Dale McLemore(1970)對「陌生人社會學」的批判指涉及概念內容的取向分析，然而其文本分析的根據，如前所述並未包括《貨幣哲學》裡的相關論述。此外，關於概念內容的詮釋範圍，只局限在「新來者」和「邊緣人」的社會類型，若是對照 Simmel 兩份文本舉出的各式例子，商人、內部敵人、窮人、傾聽者、仲裁者、眾矢之的、我群的、他者的...，所有「在空間上屬於團體成員者，卻在社會意義還不屬於團體一份子」(Wood, 1934: 86)的社會關係，其實不全然是團體動力過程的負面衝撞力，往往因為尚未被團體全面接納，反而也不受限於團體的種種規範壓力，因為享有遊走團體內外的自由，對團體提供意想不到的創造力，或是發揮了正面的凝聚助力。所以，Simmel 的「陌生人」概念不只是社會整合以及文化融合與否的成敗過程，Simmel 的「陌生人」概念不全是社會問題式的關懷(如表二)。Simmel 的「陌生人」概念蘊含極大的空間猶待關心陌生人論題的研究者填入更多不同時代的生活經驗，而其彈性表現在勞動與移民、在現代都市、在跨國婚姻、在照護關係...等晚期現代社會的生活脈絡裡都找得到線索，Simmel 的陌生人論題關心的是日常生活的正常片段，但是這些片段常常夾雜了複雜的主觀感受挑動不容忽視的社會事實，逼使人們思考與經營這些浮現在意識層次的社會關係。

### 暫時的結論

這篇文章首先討論了「異鄉人」抑或「陌生人」的翻譯問題，基於名詞涵括的範圍以及時代經驗的考量，即使「異鄉人」適切地表達出「邊緣人」的意涵，但是相較而言，「陌生人」較能既包含「異鄉人」又容納社會適應的動態過程以及現代性的生活經驗。接著本文重回 Simmel 的「陌生人」文本，強調對照《貨幣哲學》和《社會學》裡兩篇文本，才能比較完整地整理出陌生人論題的論述脈

絡與層次。忽略了《貨幣哲學》裡的陌生人往往使得研究者受限於社會整合的失敗經驗，而忽略了錢所帶動的相關重要的現代生活經驗，以致偏重社會問題式的研究取向。最後，藉由 Dale McLemore(1970)的「陌生人社會學」批判，重新檢視「陌生人社會學」在參照 Simmel 的「陌生人」文本方面的缺失，批判其文本詮釋涉及面向與層次的限制，這些遺漏正需要借助關心當前都市生活經驗與晚期現代社會制度特性的研究成果來加以填補，也是本文下一步要進行的討論方向。

## 參考文獻

- 涯鴻、宇聲等譯，1991，〈陌生人〉，《橋與門—齊美爾隨筆集》，上海：三聯。
- 陸先恆、馬家輝合譯，1993，〈異鄉人〉，《當代》，91: 94-9。
- 費勇譯，2001，〈陌生人〉，費勇、吳燕譯，《時尚的哲學》，北京：文化藝術，110-5。
- 林榮遠譯，2002，〈陌生人〉，《社會學》，北京：華夏，512-6。
- 林榮遠譯，2002，〈陌生人〉，《社會是如何可能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341-8。
- 孫善豪、魯貴顯合譯，2004，〈附論異鄉人〉，《海峽兩岸民主社會主義通訊》，48: 49: 50:17-8。
- 鄧建邦，2002，〈接近的距離：中國大陸台資廠的核心大陸員工與台商〉。《台灣社會學》3: 211-251。
- 魏書娥，2001，〈全球化趨勢與全球性思考〉，收錄於顧忠華主編，《第二現代—風險社會的出路？》。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魏書娥，2002，〈Simmel 與現代/後現代〉，《歐美研究》第 32 卷第 3 期，393-4  
台北：中研院歐美所。
- Bauman, Z. (2002), *Thinking sociologically*. 朱道凱譯，《社會學動動腦》，台北：群學出版公司。
- Alexander, J.C. (2004) "Rethinking strangeness: from structures in space to discourses" in civil society. *Thesis Eleven*, 79: 87-104.
- Bauman, Z. (1988) Strange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and particularity. *Telos*, 78: 7-42.
- Levin, Donald, N. 1971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43-9.
- McLemore, D.S. (1970) Simmel's 'stranger': a critique of the concept. *The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13(2): 86-94.
- Merz-Benz, P.-U. & Wagner, G. (2002) *Der Fremde als sozialer Typus*, Konstanz: UVK-Verlagsgesellschaft mbH.
- Park, Robert E. and Ernst W. Burgess. 1921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322-7.
- Robertson, R.(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SAGE Publications.
- Simmel, G. (1900) *Philosophie des Geldes*. Leipzig. S. 223-228, auch in GSG6,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89, S. 284-291, oder in Drittes Kapitel: Das Geld in den Zweckreihen(Auszug) in: Peter-Ulrich Merz-Benz & Gerhard Wagner(Hrsg.) *Der Fremd als sozialer Typus*. Konstanz 2002, S. 39-45.
- Simmel, G. (1908) Exkurs ueber den Fremden, in: *Soziologie: Untersuchungen ueber die Formen der Vergesellschaftung*. Berlin. S. 509-512, auch in GSG11,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2, S. 764-771, oder in Peter-Ulrich Merz-Benz & Gerhard Wagner(Hrsg.) *Der Fremd als sozialer Typus*. Konstanz 2002, S. 47-53.

Wolff, Kurt, H. 1950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London: The Free Press. pp.: 402-8.